



重  
编  
版

1912-1928

# 文武北洋

“武”是那个时代的表象，而“文”才是那个时代的追求。

李浩 著

风  
流  
篇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12-1928

# 文武北洋

风流篇

李洁 著



重  
编  
版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1912 ~ 1928: 文武北洋·风流篇 / 李洁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213-04841-8

I . ① 1… II . ①李… III . ①文人 - 人物研究 - 中国 - 1912 ~ 1928 IV . ①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8930 号

书 名	1912—1928：文武北洋·风流篇
作 者	李洁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章依
责任校对	叶宇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16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841-8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重编版序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即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冲开覆盖在历史上的层层污秽或金粉——后人强涂在“好人”身上的金粉，其实和覆盖在“坏人”身上的污秽一样，都是对其本人和历史原貌的一种污损。总之，我是想尽量看清我感兴趣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与体态，再通过他们，了解一下他们那个时代的真相。

我对真相感兴趣，并自信许多朋友像我一样对历史真相感兴趣。于是，我开始有计划地写这本书。

我选了民国初期，亦即北洋政府时代，开始了我的“清污工程”（前面说了，洗去金粉也算是清污）。我从一本本史料里，找到九位我最感兴趣的人——那会儿，我忘了“好人”和“坏人”的正统定位，然后，一个个地细读他们。逐渐地，九位各有非凡魅力的故人从历史屏幕的最黑处一个一个地显示在我眼前，接受我的访谈。我至今都感到庆幸——我找对人了！

我用指尖在键盘上记下了与他们的长时间的交谈。我从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开始，1999年底，我写完李大钊。2000年，我写了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和杨度（其中几篇，曾应邀在人民出版社的《人物》杂志上发表）。2001年，我写了吴佩孚。2002年，我写了张作霖。

至2003年“非典”肆行全国时，我安静地写了陈独秀与章士钊。

九篇文章，不伦不类，既非人物传记，亦非旅游笔记。但每一篇，我都是认真记的。我很想让读者朋友从这九篇文章中窥知一点那个时代的真模样。

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公司推出拙著；两年后，又推出增订版。2005年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拙著分上、下册在海外出版发行。如果说数年前拙著在小的读书圈里稍有影响的话，那应该感谢优秀出版家刘瑞琳女士和她年轻的团队。

八年前，闹“非典”，我写完这本书，便又回了懈怠状态，除一本轻松的人文风景介绍《风流故居》外，再无写作欲望。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朋友曾催促重出此书，均被我谢绝。不料，今夏，原先的报界朋友王小山转身成为“铁葫芦图书”当家人，逼我将此旧书通过他们团队再交给读者。时过八年，重温旧作，实不忍卒读！当初，对人物的研判、对史料的掌握、对读者心理的拿捏、对出版标准的考量，都过于随意。为不敷衍读者，我只能恭敬从命，用三个月的时间，重编了此书，故名“重编版”。

图片自然也比上两版丰富了不少。这些图片，凡历史照片，多是本人经年累积的；凡现实场景，则无一不是本人在各地亲手拍摄的。如有读者喜欢并留用这些图片，谨请注明之。

全部文字与图片编完后，自己掂掂，分量尚足，遂上缴作业，恭请读者朋友们批阅吧！

我既非历史学家，更非专业作家，我只是一个旅人，一个有兴趣跟着故人在故址上看故史的旅人。

谢谢朋友们！

李洁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

### ——增订版序

我也没想到，《文武北洋》会一直有人读。

我是一个喜欢寻找真实历史境况的旅人。只因怕那些荒冢一样颜色的“真相”被时代的残砖碎瓦所埋没，所以，我大着胆子走进一条条被废弃的巷子里，推开那里面的每一扇虚掩着的旧日宅门，定睛搜看阴影里的一切。

“真相”往往还斜悬在结满蛛网的褐色的壁上。

我怀着敬畏之心描摹我所发现的东西，尽管我努力画下的也许还不是真相，但至少比人云亦云的某些所谓的定论更接近本质。

我的行囊里没有来路不明的海外孤本，我的导游图全部是大陆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我把国家利益当成评判历史巨子和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我的直觉每每在史料与遗址的场景切换中得以印证。

我行，我记；我思，我写。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每过一段时间，便有了讲述的欲望。2004年1月版的《文武北洋》，就是一次话题比较集中的讲述。

尽管我的“北洋观”得到了一些有独立思想的朋友的认可，但散落在各章节里的不少谬误每每让我暗自汗颜。书出两年，两次加印，仍不能抹去很多遗憾。

2005年夏天，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将我书中的“赳赳武夫”与“彬彬文士”拆成《文武北洋·枭雄篇》与《文武北洋·风流篇》，分两本出版，使我有机会将原书稿审视和订正了一遍。我加进了若干新读到的史料，删掉了有些不尽合理的表述，改正了一些看得出来的失误。原以为修订即减肥，却不料，一通必要的营养滋补后，我的“北洋人物”非但没有瘦身，反倒比原来更“硕壮”一些了。

因总在行色匆匆地找寻，更因本人功底的浅薄和才气的不足，我的文字总是丢三落四。即使此番重新拾掇了一通，也还会有种种露怯处。但是，我敢说，我呈现给读者朋友的每一行文字，都是真情的脉动。

我会一直这么找下去。是兴致，更是责任。

李洁

2006年4月11日于青岛凯旋山庄

## 初版自序

敲完本书最末一行文字的时候，2003年的最后一阵秋风已经远去。不知道我的这些文字是否也能搭上时令的班车，把一股稍带肃杀之气的“真”带往远方，让喜欢历史的读者朋友们能临风抖擞一下。

我不喜欢温吞而平庸的天气。在因袭的云絮下活得太久，会不知道云外的阳光是七彩的。所以，我幻想自己的这些文字能如冷空气一样，吹开凝固了很久的传统的云团，让人冷静片刻，再回望一下斑斓的历史。

五年前，我写那本《百年独语》时，也是这样想的。

在那本“独语”书中，我用自已的话，讲述了晚清、民国、共和国的几位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与人们听惯的说法相迥，故有朋友笑言：你这是对百年历史的“毒”语。我只笑笑，并不解释，继续于本职工作之余，寻百年来一些巨子的遗迹，并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独语”我对近代史的一己之见。

这本书里，我集中记录了我对民国初期，亦即“北洋军阀时代”的寻找与发现。站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五位武人和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四位文人的故址上，我瞻前顾后了一番，忍不住又“独语”起来。

鼓励我用自已的话表述历史的，是本书主人公之一陈独秀先生。他



老人家至死不说假话。他说：“我不敢自吹我是敢于说老实话，我只自誓，宁可让人们此时不相信我的说话，而不愿利用社会的弱点和迎合青年的心理，使他们到了醒觉之时，怨我说谎话欺骗了他们！……说老实话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说老实话的风气一天盛似一天，科学才会发达，政治才会清明，社会才会有生气……”

于是，我就想对大家说：北洋时代可能并非一个完全“反动”的无序的时代，也可能并非一个颠预武夫秉政、人文思想沦陷的时代。也许，它是古老中华第一次走上选票时代的艰难肇始，是一些大人物意欲让中国融入世界游戏规则中的笨拙尝试。“武”只是那个时期的表象，而“文”才是那个时代的追求。所谓好人、坏人，所谓正确、谬误，我没顾上区分，所以只好请读者自己评判吧。

应该告诉你的是：我对所有试图推进中国历史进程的先人都怀有敬意。

最后，我要感谢这些年来陪我慢慢走过历史遗址的各位旅伴，当然，更要感谢在漫长人生旅途中所有对我援手施助过的人。

李洁

2003年初冬于青岛浮山之麓山海楼

◆ 目 录 ◆

重编版序 1

开始是兴致，后来是责任 3

——增订版序

初版自序 5

第一章 市井有谁知国士 1

——沪上「遇」杨度

第二章 长青的孤桐 71

——章士钊京华故居行

第三章 失去的灰墙 143

——李大钊殉难地寻觅记

第四章 蒙尘独秀峰 261

——祭陈独秀

参考文献 253

---

# 第一章

---

## 市井有谁知国士

——沪上「遇」杨度





杨度（1875—1931）



杨度，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本名杨承瓚，字哲子。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津门还是岛城，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了搭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洋楼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做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的宅第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曾几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曾有杨度的“悦庐”。数年前，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此胡同，几百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任何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

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出门倒垃圾的中年居民说，他家老辈就住这条胡同，不知道杨度是干什么的。至于老宅子嘛，没了，一个也没了，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从前的大宅子，但现在都拆了。

回看“胡同西头儿北边”，正是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

丰盛胡同里，有几家中央级单位，而这几个单位，又都与曾经住在这里的这位奇人有着奇妙的关联。胡同南边有中央编译局——杨度乃清代最有名的宪政鼓吹者，他创办的第一本刊物，叫《游学译编》，是近代中国翻译介绍各国政治体制的最早期刊；胡同北边有中国法学会——杨度不仅是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还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彼时的大法学家；胡同东头有国家档案局——杨度担任过清廷内阁统计局局长，那时的统计局，兼有后世的档案局职能。你看，他的主要人生履历，都与丰盛胡同的三个“国”字号单位有关。可是，丰盛胡同，乃至整个京城，却没有给他保存一席之地。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

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 20 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一次是在 1995 年 6 月 1 日，那一天因与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还有一次是 2000 年 1 月 8 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



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记者高晨女士领我去看前朝的“周公馆”。

从幽静的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偶然看见一方嵌在里弄口墙上的小小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确乎与杨某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市井有谁知国士？

是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 二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前几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羨林等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